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 孔尚任和桃花扇

胡 雪 冈

•37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

这套丛书是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内容包括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以及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丛书的编写力求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叙述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

108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孔尚任和桃花扇

胡 雪 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5 字数 59,000

1985 年 4 月第 1 版 198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统一书号：10186·529 定价：0.33 元

## 目 次

一、孔尚任生活的时代	1
二、石门山隐居	9
三、出仕与三年江淮治河生活	16
四、《湖海集》和《小忽雷》传奇	27
五、《桃花扇》的创作	35
(一)“三易稿而书成”	35
(二)“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39
(三)“桃花扇底送南朝”	44
六、《桃花扇》的主要人物形象	50
七、《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82
(一)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	82
(二)戏剧布局结构的特色	87
(三)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成就	93
(四)词曲、说白的独特风格	98
八、结语	104

## 一、孔尚任生活的时代

在清初的剧坛上，人们把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长生殿》相提并论。它们广泛传播，出现了“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sup>①</sup>的盛况。“南洪北孔”<sup>②</sup>便成为照耀着当时文坛的双星。

孔尚任，字季重，又字聘之，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他出生于公元一六四八年，是清王朝建立的第五年，上距南明福王被俘只有三年。这时，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一带，张煌言和郑成功仍同清王朝进行着坚决的斗争，而且，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部下的李来亨、郝摇旗在川、鄂交界，张献忠部下的李定国等在云贵一带，都还在继续抗击清军，时间长达二十年之久。此外，各地的抗清运动也此起彼伏。单从这一页历史就可看出，孔尚任是在清兵入关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岁月中出生和成长的。

孔尚任自称“《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桃花扇》小引）。所谓“南朝新事”其实就是南明王朝覆

<sup>①</sup>见金埴《不下带编杂缀兼诗话》卷二。<sup>②</sup>见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二。

亡的历史。明朝末期，由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克了明朝的国都北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煤山自缢。三月二十七日，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使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五月一日，清兵攻占北京，第二年便大举南下。

北京沦陷后一个多月，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的官僚地主群，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小朝廷，年号弘光。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弘光皇帝是个荒淫佚乐的家伙，他深居宫中，奸污幼女，饮火酒<sup>①</sup>，甚至“以演戏不视朝”<sup>②</sup>。而那些刚刚拼凑在一起的大小官僚，也整日忙于争权夺利，乘机搜刮钱财，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当时流行的一首民谣就曾作了生动的揭露和讽刺：“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sup>③</sup>尽管这时民族矛盾已发展成为主要矛盾，但是腐朽的南明政权却视若无睹，仍然极端仇视农民起义军，“刻刻以复仇为念”，甚至派人和清军议和，要求“合师进讨”。另一方面，南明统治集团又千方百计地排挤、打击、迫害爱国官吏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以卑鄙的手段镇压“复社”文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复社”的前身是于明朝万历年间出现的东林党。东林党人原是一些文人学士，开始时

---

①见计六奇编《明季南略》卷五。 ②③见《南明野史》卷上。

他们通过东林书院讲学来揭露、指责时政，力图改良政治。他们倡导纲常名节，反对阉党的暴虐专横和官吏的贪污枉法，这就与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处于对立的地位，而遭到了魏忠贤残酷的杀戮和禁锢。天启六年（公元 1626 年）三月，魏忠贤派缇骑至苏州搜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苏州市民极为愤慨，自觉地起来保护他。这次斗争虽然最后还是失败了，周顺昌被带到北京遭到杀害，但它却表明东林党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

崇祯初年，张溥<sup>①</sup>等人又组织“复社”，自称是东林党的继承者。崇祯五年（公元 1632 年）在苏州虎丘召开复社大会，到会的来自全国各地达“数千人”<sup>②</sup>。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文社组织，比东林党的规模和影响更为巨大。据吴应箕编的《复社姓氏录》所著录复社成员共二千零二十五人。黄宗羲、顾炎武、陈贞慧、吴应箕、周钟、冒辟疆、侯方域等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秋七月，大家推黄宗羲为首，由吴应箕执笔作揭露阮大铖罪恶的《留都防乱揭》，联合署名的有黄宗羲、侯方域等一百四十多人。他们要求立即驱逐阮大铖出境<sup>③</sup>。这是明末“复社”进步力量对阉党残余势力展开坚决斗争

<sup>①</sup>张溥：字天如，太仓人。著有《七录斋集》等。他的《五人墓碑记》记叙了当时苏州市民支持东林党人向魏忠贤阉党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sup>②</sup>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sup>③</sup>《桃花扇》中根据情节的需要，把《留都防乱揭》这一事件写在“崇祯癸未（公元 1643 年）二月”。“留都”指南京。

的表现。阮大铖曾卖身投靠魏忠贤，并与熹宗乳母客氏（魏忠贤的姘妇）相勾结，做了他们的干儿子。南明王朝成立后，阮大铖凭借掌握的实权，倒行逆施，对署名的一百四十余人，恨之入骨，“欲尽杀之”<sup>①</sup>。侯方域、陈贞慧、吴应箕等，都屡遭打击迫害，饱受折磨。当时，“复社”文人在广大人民积极参加反清斗争的激励下，通过政治斗争的实践，把东林党所倡导的封建纲常名节，提到了民族气节的高度，并贯彻到他们的行动中去。如黄宗羲的坚贞不渝，顾炎武的投身抗清斗争，吴应箕、陈子龙等都因参加抗清起义军而被杀，壮烈殉国，方密之随桂王到云南，最后做了和尚，陈贞慧则“埋身土室，不入城市”<sup>②</sup>。这些情况表明，崇尚民族气节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复社”文人与阉党余孽阮大铖的斗争，不仅是明末统治阶级内部两种力量尖锐激烈斗争的继续，而且已转化为在民族矛盾中坚持抗清与投降媚敌的斗争。

当时，福王政权仍拥有较为雄厚的兵力，江淮的四镇<sup>③</sup>总兵力约有二、三十万，此外，武汉驻扎着左良玉的三十六营，湖南的何腾蛟，江西的袁继成，广东的瞿式耜，都各拥重兵，完全有能力抵御清军的南下。但南明王朝在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操纵下，却

---

①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见《鲒埼亭文集》。  
②黄宗羲《南雷文定·陈定生先生墓志铭》。  
③四镇：刘泽清驻淮安（今江苏淮安县），刘良佐驻寿州（今安徽寿县），高杰驻徐州（今江苏徐州市），黄得功驻庐州（今安徽合肥市）。

背叛民族利益，竟派兵部侍郎左懋第等三人携带银十万两，金一千两，缎绢一万匹送给清朝，乞求议和，而且对吴三桂的变节行为，表示了祝贺，并封他为蓟国公<sup>①</sup>。南明王朝腐朽到了如此地步，所以建立仅一年就在清兵的攻击下覆亡了。清王朝统治者依靠他们的军事力量，终于巩固了对全国的统治。

孔尚任生活的时代，正是康熙君临天下的六十一年<sup>②</sup>。康熙即位后，励精图治，实行了一些有效措施，如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等，使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家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因此，这一时期曾被封建史家讴歌为“升平盛世”。不过也应当看到，清朝贵族在全国建立起统治特权的过程，也是以暴力实行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的过程。如在军事上，对其他各族人民此起彼伏的抗清斗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连康熙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sup>③</sup>。在经济上，扩大和维持满洲贵族的特权利益，用来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享受。据康熙《大清会典》记载，宗室勋戚在近京的庄田圈占土地达十六万多顷。在政治上，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对汉族官僚地主及文人学士大加笼络，用怀柔来收买人心。但毕竟不能全部奏效，于是高压的文字狱，接连发生，造成了许多悲惨的案

---

①见计六奇编《明季南略》卷八。 ②康熙于公元一六六二年接皇帝位，至公元一七二二年共六十一年。孔尚任卒于康熙五十七年（公元 1718 年），年七十一岁。 ③《东华录》卷八九。

件；并严禁文人结社，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如康熙二年（公元 1663 年）的刻《明史》一案<sup>①</sup>，除庄廷钺先死，“焚其骨”外，而被残杀者共达七十余人，受株连的近二百人。康熙五十年（公元 1711 年）又发生戴名世《南山集》案<sup>②</sup>。此案根据原来刑部的判决，牵连三百余人。但康熙皇帝为了对汉族文人实行怀柔分化，所以故作宽大，只处斩了戴名世一人。在文化思想上，崇奉孔子，提倡程、朱理学，康熙亲自编《御纂朱子全书》作为官方哲学，竭力宣扬忠君思想和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颁行八股取士制度，借此窒息人们的民族意识。康熙十七年（公元 1678 年），又宣布在北京开设“博学鸿儒科”，罗致了一批“名士”，凡录取者，俱授以翰林院的官职。这不但束缚了文人的思想，并使一部分士大夫更加死心塌地为清朝政府效劳。

清代初叶也有不少有政治远见和理想的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矛盾，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如陈子龙、

①明朝宰相朱国桢编写的《明史》中《列朝诸臣传》部分，当时尚未刊行于世。庄廷钺从朱国桢的后人那里，买来此稿本，将它和自己所补的明末崇祯朝历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他所增添的这部分内容，多有指斥满人的文句，以致被人告发，结果酿成了这场“庄氏史案”（事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二）。②戴名世著《南山集》引用了桐城方孝标《滇黔纪闻》一书的材料，对南明王朝颇发感慨，寄以同情，并书南明桂王永历年号。当时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戴名世为书狂悖。结果戴名世被斩（事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二）。

顾炎武、王夫之、屈大均、夏完淳、杜浚<sup>①</sup>等人的诗篇，抚事感时，蕴含着悲愤沉痛的遗民情怀。此外，陈忱的《水浒后传》、钱彩的《说岳全传》、熊大木的《杨家将》等小说也都有所寄托，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在戏剧创作方面，吸取了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单刀会》的创作经验，并继承了明代传奇《鸣凤记》直接描写当代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李玉的《清忠谱》就是反映苏州市民起来反对魏忠贤等的专横跋扈，以及他们援救周顺昌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吴伟业的《秣陵春》，通过南唐徐适和黄展娘的爱情故事，来抒发对于亡明的故国之思。洪昇的《长生殿》则敷演传统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曲折地表达了缅怀故国山河的兴亡之感。正如作者在《自序》中说的“垂戒来世，意即寓焉”。这类反阉宦、反权臣的时事戏和采用历史题材借古讽今的历史剧，在当时影响非常广泛，民间流传着一句口头禅说“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收拾起”撷自李玉《千忠戮·惨睹》“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唱词。“不提防”采自洪昇《长生殿·弹词》：“不提防余年值乱离”唱词。孔尚任的《桃花扇·骂筵》一出，也曾引用了《鸣凤记》的部分情节，以严嵩、赵文华来比马士英和阮大铖，让李香君唱出：“丑脸恶态，演出真《鸣凤》。”

<sup>①</sup>孔尚任与爱国诗人杜浚有过亲密的交往，他曾说：“仆与先生交最晚，而先生交仆最真。”（《湖海集》卷十一札《与杜于皇》）。

由上可知，《桃花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古典戏曲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剧作家，孔尚任敏锐地呼吸到了时代的气息，在《桃花扇》中成功地写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并“借离合之情”来抒发自己的“兴亡之感”。这种“兴亡之感”与广大人民强烈的故国之思和切肤的亡国之痛是一致的，因而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诚如作者的朋友顾彩在序文中所说：“可以当长歌，可以代痛哭。”在艺术上，孔尚任很注意总结前辈剧作家宝贵的创作经验，既吸收前人有益的东西，又尽力克服他们创作上的缺陷，因此能以新颖的艺术构思，诗一般的语言，寓褒贬的写史笔法，写出这样一部辉煌的《桃花扇》传奇，把我国古典历史剧的创作，推向更高的阶段。

## 二、石门山隐居

孔尚任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家有良田三十顷<sup>①</sup>，他本人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父亲孔贞璠，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举人。“博学多才，崇尚气节，尝慕朱家、郭解之为人。当明季，兵荒荐至，解纷御侮，一邑赖之”<sup>②</sup>。明亡后，隐居不仕，可见他的父亲是一位崇尚民族气节的遗民。明末时，清兵数次骚扰山东等地，如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二月，大掠鲁南莱阳、兗州一带，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村无一人，大火南北延续四十余里。孔尚任自称“生平更无两人”的好友颜修来的父亲就是在这次杀掠中，被砍伤左脚后抓走的。颜的母亲也因不肯随清兵同行，终被杀死在城墙之下<sup>③</sup>。这次惨绝人寰的杀戮和洗劫，给崇尚民族气节的孔贞璠带来了巨大的创痛，进而促成了他御侮任侠的性格。少年时代的孔尚任，正是在父亲的教育、熏陶和影响之下，逐渐滋长了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数年之后，孔尚任在《与颜修来》

---

①吴青霞《秀灌堂集》三集《寄岸堂》。  
②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九十三。朱家、郭解，均为汉时之游侠，见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  
③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十二。

的信中写到：“沧桑虽更，劫灰未净。”可见他对清统治者的暴虐行为以及朋友的悲痛身世是念念不忘的。他的《经废村》诗记叙了战乱后的村落荒凉衰败的景象：

此地楼台几劫灰？残阳满巷久徘徊。  
高低石院留僧住，昏晓柴门放燕来。大树正当行处长，荒丘多是战时埋。  
凄凉废井寻遗老，旧本蔷薇自谢开。

诗写得很沉痛，字里行间寄寓了诗人难遣的悲愤和辛酸。

孔尚任二十岁左右，还与父亲的朋友，《木皮鼓词》的作者贾应宠有过交往。贾应宠字退思，号凫西。晚年因喜说鼓词，自号木皮散客。他亲身经历了明亡的惨变，因此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感遇二首》中曾愤慨地说：“汉魏已禅代，犹疑是秦时。”并常常借说鼓词，间以嬉笑怒骂，抨击社会弊病，抒发对现实的愤懑。孔尚任少时曾听过他讲授《论语》，感到其中许多见解“皆翻案语”，与先儒不同。贾应宠对这位晚辈也十分器重，“故友谁还在，新知我自陪”，这“新知”中显然包括了孔尚任。后来孔尚任为这位爱国老诗人写过一篇《木皮散客传》，把他的性格气质刻划得十分鲜明生动，赞扬他“狂狷(juàn倦)①，亦圣人之徒也”；又在《桃花扇》第二出《听稗》中，借用了他的《太师挚适齐》篇中“即春秋鲁国三家

---

①狂狷：语出《论语·子路》，这里作偏激解。

僭窃之罪”的鼓词，其中有“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等抨击现实，愤世疾俗的句子。对此，《桃花扇》眉批特别指明“颇合时事”，“令人猛省”，“此《桃花扇》大旨也”。说明贾应宠的政治思想、态度对青年孔尚任的影响非常深刻。

康熙十七年(公元 1678 年)秋天，孔尚任买下了座落在曲阜县北四十里景色秀媚的石门山(古称云亭山)。在此地，他筑了一幢书堂，名孤云草堂，开辟了一处园圃，在园子里修置了一座长松亭，四周群山高耸，佳木成荫，溪水环流，这里成了他与朋友谈论古今，“乐道著书”<sup>①</sup>，搜奇探胜，寄情山水之地。这一年正月，正是康熙下诏开设博学鸿儒科，以搜罗汉族士大夫和山林隐逸来为清王朝服务，当时，朱彝尊、尤侗、毛奇龄、吴雯、阎若璩等名士，都曾出来应征，一些遗民隐士也纷纷“下山”出仕。而孔尚任偏偏在这年秋天，进山隐居，选择了“安善其体，明哲其心”(《告山灵文》)的生活道路。他这种行为，一方面固然是受父亲“养亲不仕”的遗民思想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清初诸儒所倡导的读书之风密切相关。孔尚任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以昼夜读书不息的东汉高凤和汉末结庐隐居不仕的焦光自比，“高凤乐读书，焦光苦辞诏<sup>②</sup>。古人踪易追，时局老难料。吾辟

---

①倪匡世《诗最》。 ②诏：诏书，皇帝的命令或文告。

有石门，与君颇同调。登岱<sup>①</sup>遥相期，过岭终践约。  
鸡肋何足贪，儒冠将弃溺。往来采药人，寄函发一笑”  
(《和林桐叔归石岳诗》)。当然，孔尚任在入山后的第三年，也曾“典尽负郭田”，以生员的身份捐了个国子监生，这件事可能与他作为“圣裔”的身份有关。因为按照惯例，作为孔门子孙，除“衍圣公”(封建统治者授予孔子后裔的世袭封号，掌奉阙里庙祀)是世袭外，其他孔府各职均须按朝廷品级录用，就是最末的“学录”<sup>②</sup>，也必须“由衍圣公咨送孔氏生员题补”。看来生员、监生是孔门圣裔所必需具备的政治身份。就以康熙那次南巡路经曲阜祭孔来看，出来逢迎的有“四姓子孙名列仕籍者三十五人”，“监生、生员三百人”，而孔尚任就是以监生的身份“时在诸生班内”<sup>③</sup>。可见，孔尚任捐纳国子监生可能是出于无奈。因此他放弃了参加乡会试以继续升官的机会<sup>④</sup>，并一再表白自己结庐隐居的心迹：“在昔晨门张叔明辈，俱隐兹山，继其芳躅<sup>⑤</sup>，尤所素愿。”(《告山灵文》)晨门是春秋时鲁国的一位高士，张叔明是唐代的隐士，与李白等号称竹溪六逸<sup>⑥</sup>，他们都曾隐居石门山。有一次孔尚任当着弟弟莓垣的面，一边指点城廓，一边笑

---

①岱：泰山的别名。 ②据《清史稿·职官志》“衍圣公”条记述，在衍圣公下，其属于孔氏的官员中，有尼山书院学录，洙泗书院学录等，均由衍圣公提名充补。 ③《孔尚任诗文集》卷六《出山异数记》。 ④据梁章钜《南省公余录》卷四载“国初捐纳之贡监举人，不得与乡试会试”，到了“乾隆元年，始准一体应试”。 ⑤芳躅：谓前贤之遗迹。 ⑥见《旧唐书·李白传》。

着说：“攘名噉利<sup>①</sup>，丝丝聚讼者，都在白烟一抹中，尔不见我，我不见尔，相去何啻百尺哉！”孔尚任对功名的淡薄，于此可见一斑。甚至在数年后，他还把自己捐例监的行为自嘲为“支离可笑”，“倒行逆施，不足为外人道”（《与颜修来》）。孔尚任在石门山住了大约四年，他的青年时代主要是在避世隐居与刻苦研读中度过的。

在石门山这段时间里，孔尚任将礼、乐、兵、农的研究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写有《律吕管见》一书。“礼乐兵农”的经世致用之学是与明末清初那些空谈义理的学风相对立的，这正是“颜李学派”<sup>②</sup>和许多遗民学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学术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青年时代的孔尚任就以气节自尚，自然倾向于经世致用之学。他治学主张：“必求有益于身心，有益于经济，而不但为辞章训诂之儒，则仆之深愿。”（《答卓子任》）反对那种为仕进而习六经的做法，“惜乎今之攻六经，取青紫<sup>③</sup>者，不惟不卫吾道，而且阑入<sup>④</sup>彼中，操倒行逆施之戈”（《答王安节》），并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付诸于实践，“予自少留意礼、乐、兵、农诸学，亦稍稍见之施行矣”（《大学辩业题辞》）。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政治倾向。同时他对民俗和历

①攘名噉利：争名好利。②“颜李学派”：颜是颜元，号习斋（公元1635—1704年）；李即李塨，号恕谷（公元1659—1733年）他们坚决反对程朱理学，主张实用、实行。孔尚任与李塨有过较为亲密的交往。③青紫：卿大夫之服，这里借指官爵。④阑入：擅自进入。

史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搜集了不少材料，编有《节序同风录》、《鲁谚》等，其中《鲁谚》尚未集。虽然如此，孔尚任并未忘情于现实，尤其是南明覆亡的历史教训更引起了他深沉的思考和认真的探索。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学者曾经企图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加以说明：为什么南明王朝这样快地覆亡？而孔尚任则试图通过舞台艺术形象来揭示南明王朝没落的必然性，总结遭受这场巨大灾难的原因。就在这时，他“博采遗闻”，开始了《桃花扇》传奇创作的酝酿。在《桃花扇本末》中提到的“崇祯末为南部曹”的族兄孔尚则（方训），曾任弘光朝的刑部主事，是南明王朝兴亡始末的目睹者，入清后隐居曲阜家中，他逝世时，孔尚任尚未成年。孔尚任获知弘光遗事，并不是直接得之于孔尚则的口述，而是间接地通过其舅翁秦光仪的转述。其中李香君面血溅扇的轶闻，激起了孔尚任写《桃花扇》的愿望，他说：“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①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②，无弗同者，盖实录也。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桃花扇本末》）由此可知，《桃花扇》所选的题材，大都可作信史，所

---

①旋里：回归家乡。 ②稗记：记录遗闻琐事之书。